

•权威视点•

编者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新一届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新型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指出:新型智库建设关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乎国家软实力的战略提升,智库建设要有担当有格局有谋略。这为当前新形势下推进江苏智库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智库建设要有担当有格局有谋略

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燕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大力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前不久,在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围绕如何建好用好智库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高端智库要把握好定位和方向,有大的担当、大的格局、大的谋略,在服务中央决策上发挥引领作用,在世界知名智库中争取一席之地。这为当前新形势下推进智库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有担当

理论为国家而强,智库因时代而

生。新型智库建设关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乎国家软实力的战略提升。新型智库只有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忠于使命、勇于担当,更好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才能充分发挥好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增强使命意识。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其发展水平已成为“国家智商”的重要“标度”,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国家治理

中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智库能否确立高度自觉与使命担当,也决定着其能够登多高、走多远、抵达何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面临着各种挑战、艰险、矛盾和困难,迫切需要一批专业化高端智库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精准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新型智库只有勇于担当、善于担当、精于担当,才能成为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驱动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性架构,成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战略提升的重要抓手,从而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把牢方向导向。担当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原则。新型智库的使命担当,就是要坚持党性原则,把牢方向、把准导向,

本期要目

- 王燕文:智库建设要有担当有格局有谋略
- 苏州大学学报 110 周年刊庆暨中国高校学报 110 周年纪念大会召开
- 张劲松教授研究成果被教育部采纳
- 东吴论坛——“新媒介青年文化”第四期工作坊圆满落幕
- 刘亮:不盲从麦甘“全球智库报告”

·权威视点·

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智库工作之始终。智库作为思想库,必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有别于西方智库,也超越于传统智库。在性质上,我们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言献策的“中国智库”,绝不搞观点的“跑马场”,绝不搞“利益集团代言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度量衡、定盘星,恪守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秉持思想性与党性人民性相一致,在张扬学术研究个性和承担智库公共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融合点,自觉以国家利益至上,在重大问题上、关键范畴内,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失语、不乱语。

明确功能定位。新型智库的使命担当,还要建立在对自身功能定位的自觉认同和深刻把握基础之上。要努力当好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外脑”。新型智库一定要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天职,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努力让智库的“文章”完善“文件”,让智库的“谋划”引领“规划”,让智库的“对策”融入“决策”,做党委政府决策的“最强大脑”。要努力当好思想理论创新的“先导”。中国的实践中国人最有发言权。新型智库理应承担起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的责任,应在阐发中国理论、贡献中国智慧方面走在前列,发挥好理论引擎作用。要努力当好引领社会舆论的“向导”。新型智库应自觉以引导社会舆论、弘扬主流价值观为己任,既要积极配合“官方舆论场”,又要适时调控“民间舆论场”,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及时发声、有效发声,努力成为社会思潮的“瞭望哨”、热点敏感问题的“解说员”。

有格局

格局决定结局,有多大格局就能成就多大事。新型智库建设,绝不能囿于一地一域、一时一事,“关进小楼自成一体”,而是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构建新型智库统筹推进、协同创新、放眼世界的大格局。

构建统筹发展格局。新型智库建设,既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又要防止急功近利、一哄而上。要按照既注重成果质量、适当兼顾覆盖面的原则,着力优化和完善智库发展的区域布局、专业布局、层级布局,精心谋划党政智库、高校智库、科技和企业智库、社会智库等

不同类型智库的发展机制。既要注重体制内决策咨询,发挥官方智库的作用,同时也要注意体制外的决策咨询力量,积极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形成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协同发展的格局,推进各类智库主体统筹发展、联动发展、互补发展,构建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新型智库体系。

构建协同创新格局。新型智库不是机构和人员的简单叠加,而是各类平台和要素的优化组合,追求集成创新,实现“石墨变金刚石”的质变效应。从总体上看,我国智库数量不少,但研究力量和资源还相对分散,“拢指合拳”不多,“合纵连横”不够,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同质化、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研究,迫切需要推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不同智库主体的协同创新。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必须强化“借船出海”的意识,在注重培养自身研究力量的同时,善于向各类研究主体,特别是社科类研究机构、党政研究部门“借力”,寻求更多的研究资源支持。要摒弃“单打独斗”的思维方式,促进智库要素优化互补,多组织跨体制、跨部门、跨学科研究,努力使智库由“孤岛”变为“群岛”,以聚合融通的机制增强动力,以“1+N”的聚合蓄势发力,推动智库效应最大程度彰显、智库合力最大程度迸发。

构建放眼世界格局。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必须面向世界、放眼全球,推动决策咨询国际化发展。要心系“天下太平”,议题设置全球化。着眼人类终极关怀,自觉聚焦国际议题,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各国关心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要讲好“中国故事”,话语体系国际化。主动适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需求,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做好“智库外交”。要善借“外脑外力”,组织结构网络化。积极搭建国内外智库联合研究的高端平台,充分发挥“小机构、大网络”、“小核心、大外围”的同心圆作用,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观察世界、研究中国、思考当下,不断提升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有谋略

善谋者大成于事。出思想、献谋略、提对策,是智库的根本功能。智库之“智”绝不能是“低智”,更不能是“小聪明”,而应是一种对大局运筹帷幄、对大

势洞幽烛微、对大事铁画银钩的大谋略与大智慧。

突出前瞻性。智者前瞻,智库谋远。新型智库绝不应沦为政策的解读,而应通过高质量的“前瞻性建言”,努力做未来的“瞭望者”与战略“谋划者”。要牢固树立“策为天下先”的超前理念,始终高看一眼、远看一步、深看一层,既着眼解决当前突出问题,又面向未来发展趋势,进行超前研究,提供决策储备。要以更前瞻的视野、更前沿的思考、更前卫的选题,把政策阐释与战略预测结合起来,把决策的事后论证与决策前的咨询引导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超前创新结合起来,做好重大问题的预测、预判和预警研究,努力做到先见、先知、先谋,想决策者之所想,急决策者之所急,谋决策者之所谋。

着眼应用性。智库的生命力在于观照现实、解答问题。智库强调研究的应用价值和服务功能,建言献策要“务实、管用、解渴”。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必须强化问题意识,突出问题导向,要紧紧围绕重大理论问题研究、重大现实问题研究、重大实践经验总结,紧密结合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重点问题,找准“题眼”,精准攻关,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积极为破解发展难题开出“良方”,为社会有序治理提供“钥匙”。

彰显专业性。真正具有前瞻性、实用性的智慧与谋略,离不开长期的专业积累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作支撑。新型智库要成为战略“谋划者”,就必须明确主攻方向,坚持走专业化路子,通过滴水穿石的研究积累,打造无以替代的研究领域和无可比拟的研究优势,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精,这样的智库才有竞争力、生命力,才有贡献力、影响力。在信息化社会,大智慧离不开大数据。新型智库只有掌握现代化的研究方法,重视互联网时代需求和特征,善于运用云技术、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才能不断加强基于数据分析的决策咨询能力,才能真正为党委政府提供具有高瞻远瞩的大谋略与充满真知灼见的大智慧。

(来源:《党建》2016年第3期)

• 智库要闻 •

编者按：1906 年苏州大学学报在东吴大学创刊，创刊号名《学桴》（又名《东吴月报》），是中国第一本大学学报。近几年来，苏州大学学报作为东吴智库建设重要的成果发布平台，她以其不断追求卓越的办刊品质赢得了中国高校期刊界、学界的高度肯定与好评，其二次文献转载率一直居全国大学学报前列。为纪念苏州大学学报创刊 110 周年，5 月，我们迎来了 200 多位期刊界领导、专家共聚苏州，共同探讨新时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东吴智库支撑平台·苏州大学学报 110 周年刊庆 暨中国高校学报 110 周年纪念大会在我校召开



学报在知识生产传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不可低估，应更加努力地实现“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

来自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江苏省教育厅等单位领导发表重要讲话，对高校学报 110 周年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并结合当下世情、学情、刊情等方面为学报发展建言献策，期待学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农涛指出，中国学术期刊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办刊能力亟待提升。针对现有的突出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通过正确导向管理、规范学术期刊出版、强化报刊质量监督、推动报刊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措施促进期刊的健康发展。

教育部社政司出版处田敬诚处长强调，学报是公益性的，必须要有投入，办学报是为了提升文化实力，回报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效益。学报也是学校的窗口与名片，专业化是未来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学报未来的发展目标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刊发有问题导向的文章，全面提高学术质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服务。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双传学指出，理论因时代而强，期刊因时代而兴，期刊要多推出体现基层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社科理论成果。积极回应重大思想理论问题、重大现实问题、重大实践经验总结，使中国传统文化走进中国当代实践，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中国学术话语自主创新，以强烈的可持续意识，在深耕栏目、开发栏目、做优栏目中发现人

才、培育人才。

江苏省教育厅社政处处长王伟指出，高校学报既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又是学术交流的窗口；既是宣传教育的平台，又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在思想多元、媒体融合的新时代，本次论坛的举行体现了学报人强烈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意识。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颖介绍“我与学报”征文活动评奖情况，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姚申宣布获奖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开幕式后，以“传承、融合、创新”为主题的学术期刊高峰论坛举行。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三任前理事长潘国琪、龙协涛、武京闽，《江海学刊》杂志社总编韩璞庚，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新华文摘》杂志社总编辑喻阳，《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总编姚申，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总编高自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赵磊，清华大学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副社长肖宏，超星集团副总经理汪新红分别作了重要专题报告。

副校长、东吴智库总执事田晓明作了题为《思考与探索：苏州大学学报发展之路》的专题报告。他从面临的困境、学报的探索、取得的成效等三个方面向与会代表展示了苏州大学学报的奋斗历程，满怀深情地分享了他与学报一路走来的心得体会，寄语参会代表要爱惜学报、耐得住寂寞，并对“重振东吴学报之雄风”的目标充满了期待与希望。

最后，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叶娟丽致闭幕词，她以遗憾、幸运、迷茫、希望四个词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她强调，这是新媒体时期学报界的导航之会，为学报未来的发展拨开了迷层，让学报人看到了希望，期待中国高校学报 120 周年再聚苏大。

5 月 29 日，由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主办，我校学报编辑部和东吴智库承办的中国高校学报 110 周年纪念大会在本部红楼学术报告厅召开。近两百位期刊界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共同纪念中国高校学报 110 周年，探讨新时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与发展。我校副校长、东吴智库总执事田晓明主持了开幕式。

熊思东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对与会领导和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作为中国第一本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前身《学桴》于 1906 年创刊，是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期刊史上的重要坐标。在整个发展历程中，学报与学校发展相得益彰，学报对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强调，在新常态下，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学术期刊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学报如何顺应形势，做大做强，将是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他寄语高校学报真正成为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和引领学术的重要平台，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代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致辞。他说，学报伴随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诞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智库要闻•

张劲松教授研究成果被教育部采纳

4 月 27 日，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劲松的研究报告《实现垃圾“零填埋”的绿色城市核心行动建议》被教育部采纳上报，并供领导同志参阅。

张劲松在报告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速度越快，所产生的垃圾也就越来越多。我国绿色城市建设中垃圾分类推进艰难且垃圾处置风险也越来越大，严格实现垃圾分类、实现垃圾“零填埋”是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他认为，首先实现垃圾“零填埋”的绿色城市核心行动，需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需要各地城市的党政高度重视，要将其作为未来“十三五”期间城市的大事来抓。同时，还需要全国（地方）人大进行立法，在城市全面推行严格的垃圾分类。第二，垃圾分类要先行。垃圾分类是实现“零填

埋”的先决条件，垃圾分类必须先行，且应该从娃娃做起，要准备十年以上的“远期规划”。第三，必须实行有偿垃圾处置。除一部分垃圾资源化，废弃的垃圾需购置专用垃圾袋付费统一收集，逐步取消公共垃圾筒（箱），定时定点回收垃圾。最后，实现最终的垃圾“零填埋”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需要一个全面而组织严密的系统来设计和落实，所有核心行动，都需要有一个组织来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发挥众人之长，它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共治。

张劲松教授长期从事生态治理研究，研究成果多次被《专家建议》、《决



策参考》等采纳，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提升了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东吴论坛——“新媒介青年文化”第四期工作坊圆满落幕



6 月 13 日至 6 月 16 日，东吴论坛——“新媒介青年文化”第四期工作坊在本部子实堂 212 会议室举办。本次工作坊由我校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东吴智库和凤凰传媒学院联合举办。

新媒介青年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四位教授和一位博士生作为演讲嘉宾，围绕“文化展演理论与研究”的主题和苏州大学的师生进行学术交流。

6 月 13 日上午 9 点，在新媒介青年文化研究中心马中红主任的主持下，工作坊拉开序幕，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率

先围绕“网络流行文化数据挖掘和论文写作”分享了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经验。接着，潘教授以新媒介青年文化研究中心承担并完成的“网络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为例，与曾经参与该项目的老师和同学，回顾项目进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困惑以及心得，并就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展

电视观看”和“文化表演理论与集体行动”为主题，与参与工作坊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第四天上午，威斯康辛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 Jonathan Gray 发表“愤怒之声：媒体好坏及其意味”的报告，专门探讨受众对媒介内容的厌恶和抵抗；下午，杨国斌教授以“美国 1960 年代新左派小报与共同体想象”为主题，从 60 年代小报研究为切入点，介绍了新左派反文化、反权威的民主实践如何通过小报进行艺术性表达。两场报告均以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内容吸引了参与工作坊的老师与同学们。

开了热烈的讨论。

6 月 14 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传播艺术系博士生许怡舟，围绕“数字化重写：中国在线评论文化的审美延伸”的话题，分享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下午，来自南加州大学安能伯格学院的 David Craig 教授以“社交媒体和娱乐的新型生态”为主题进行了演讲，Craig 教授以 YouTube 为例，讲述了这类平台型媒体的发展特点，并将它们与传统的媒体进行了比较。

工作坊第三天，来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 Jonathan Gray 和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能伯格传播学院的杨国斌教授，分别以“新媒体时代下的

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陈霖教授、曾一果教授、陈一副教授参与工作坊的主持工作，张健教授、陈一副教授、杜志红副教授、牡丹老师、于莉莉老师、华昊老师、徐蒙老师等和我院众多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参加了本次工作坊。

“新媒介青年文化工作坊”已成功举办四届，彰显了驻院团队学术研究的特色和优势，进一步体现了驻院团队研究在繁荣我校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此次工作坊开阔了与会师生的学术视野，激发了学术灵感，进一步繁荣了学校文化，也为我校增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扩大学校学术影响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果巡礼•



编者按：近日，我校东吴智库研究员袁建军副教授的研究报告《国外政府创新试错的制度设计》发表在《群众·决策资讯》2016 年第 3 期。他指出：近年来，政府治理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家政治革新与发展的普遍趋势。政府创新需要想象、勇气、权力和资源，并以有效的试错容错制度和文化为保障。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创新试错容错方面，国外政府的实践做法对我国政府的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国外政府创新试错的制度设计

袁建军

近年来，政府治理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国家政治革新与发展的普遍趋势。然而，如何更大程度上促进政府创新却面临多重障碍和瓶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创新试错容错方面，国外政府的实践做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设立创新失败奖 形成宽容失败的文化

创新失败必然会带来前期政府投入资源的浪费。然而，创新探索及其失败是必要的试验成本，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好的浪费”——它不同于贪污腐败、权力滥用等寻租带来的坏的浪费。这种“好的浪费”是政府学习和试验的自然后果。从长远来说，失败的创新项目可以为创新者及其其他有志于实施创新的团体提供难得的学习机会，最终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例如，法国第 27 区项目旨在探索公共行政如何能凭借合作文化

和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实现更高效率。他们提出“友好黑客”观念，其六项核心原则之一就是专注于学习，即要求通过博客、短片、研究论文等尽可能多的途径获取文档，从而为未来的“黑客项目”创建关于过去成功和失败项目的学习课程。

美国教育部创新和进步事务副秘书长 ChinoyDabby 曾说，“很快失败，汲取教训，继续前进是美国创新精神的一部分”，政治领导人应当像科学家或者企业家一样开展公共行动，公众要学会鉴赏他们的这一角色，并能区分他们是否成功。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共管理教授 Sandford Borins 提出要保护与创新不成功有关的公务员。他认为，创新文化应能很平静地接受失败，终止不起作用的项目，并从中学习。为体现出宽容创新失败的文化理念，有城市专门设立创新失败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维塞利亚市就设有该奖项，奖给当年度最引人

注目的失败。特德·盖布勒因其在事先未经市政会议同意的情况下在电视上公开提出把市财政余额公积金归还市民的建议，就曾经获得该奖项。这一奖项的设置向政府雇员明确传达了允许创新失败的信号，并通过实质性的行动展现出这种宽容。

成立政府创新委员会 为试错提供制度保障

健全的创新管理制度，是政府创新试错的重要保障。不少国家和地区政府制定了鼓励和规范政府创新的法律条文。

例如，美国俄亥俄州法律中专设一章规范地方政府创新项目。根据规定，俄亥俄州实施由州发展局和地方政府创新委员会管理的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该项目为地方政府创新计划提供贷款和补助，州所有政府机关都可以申请地方政

•成果巡礼•



府创新项目。地方政府创新委员会成员共 15 人，包括发展局主管或其任命者、预算管理部门主管或其任命者、州审计员或其任命者、两名参议院议员、两名众议院代表等。发展局为委员会提供行政支持。除了补偿履行委员会职责必要的开支外，委员会成员不获取报酬。地方政府创新委员会主要职责包括与发展局协商制定贷款和补助标准、通过竞争程序确立受资助的创新项目并分配资金、提交评估建议书、提交报告、评比创新项目奖等。

与俄亥俄州不同，美国佛罗里达州在州法律中要求为青少年司法设置地理意义上的创新区来测试创新政策的适用性和实效，并明确了设置创新区的主体、权限、时限、资金使用规范、项目内容等。

设立政府创新基金
为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与企业创新一样，政府创新也需要充裕的资金支持，特别是初始资金。政府以类似市场化风险投资方式建立的创新基金，就是一种这样的资金。以美国俄亥俄州为例，地方政府创新项目贷款和补助的资金来自国库建立的地方政府创新基金、非公共实体的捐款以及基金自身的利息收入等。法律规定，委员会对创新计划授予的贷款和补助总数不超过 50 万美元。其中，以补助形式发放的资金最高不超过创新基金总额的

20%；为每个创新项目提供总数分别不超过 10 万美元的政府补助和贷款，平均每个项目不超过 10 万美元。

地方政府创新委员会针对创新计划申请制定评估建议书，所涉标准包括创新计划基于预期储蓄利率的预期投资回报、参与主体的数量、提议成功的可能性、可获得配套资金的占比、在其他政府机关可复制性、是否实施绩效审计或其他推荐的审计方式、申请人过去是否成功完成一项创新计划等内容。创新基金资助通常按阶段进行。首轮资助后，委员会开展评估，以季度或者委员会决定的时间表发

放每轮资助。创新计划申请方必须提供配套资金。配套资金可以由非公共机构提供。受资助方要用从创新项目获得的积蓄中偿还贷款。可见，俄亥俄州并非采取“撒胡椒面式”的资金补助的方式，而是通过竞争筛选的形式，支持相对优质的创新计划。在创新计划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全以阶段评估来决定是否继续投入，而是在项目实施结束后实施总体评估，提交报告。这就为容忍创新失败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除俄亥俄州这类集中化的地方政府创新基金资助方式以外，还有地方政府将创新项目资助权限下放到各部门，即允许政府部门积累节余作为创新资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市建立了一笔 10 万美元的创始资本，由部门首脑管理，对新倡议给予小额贷款。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把前期为平衡预算压缩的 5% 机构支出的一半返回给由制定投资计划以提高生产率或效率的各机构。以廉洁高效著称的新加坡政府也曾做出类似的改革。上世纪末，新加坡政府在废除政府部门内部预算微观管理，减少年底突击花钱、消除浪费的基础上，实施“面向 21 世纪的公共服务”计划，鼓励政府部门自主创新。

建立政府创新实验室
积极推动创新试错

政府创新实验室是政府引入产业孵化模式、推动治理创新的重要形式。创

新项目团队围绕项目目标，从内部和外部广泛征求意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方案，通过研究和比较，评选出若干较优方案，交由相应政府部门实施，并接受政府跟踪评估。

第一，广泛引入多元主体，提升创新容错水平。政府创新实验室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机构，除韩国首尔创新局、西班牙巴塞罗那都市实验室等少部分实验室外，大多政府实验室的资金来源都比较多元。充裕的资金增加了支持创新项目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资金量越丰富，风险投资主体越倾向于宽容失败。同时，由于政府创新实验室通过吸收企业、社会团体的参与，开展多方合作，后者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度要显著高于政府。这既促进了政府和社会创新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政府创新实验室的容错水平。

第二，科学评估实施效果，及时终止失败项目。创新项目总会面临着失败的风险。面对经过评估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创新项目，政府创新实验室可能会及时终止项目运行，以减少不必要的投入。纽约城市经济机会中心，是全球较少仅维持成功项目的政府创新实验室之一。该中心是一个设计和支持减少城市贫困实验性项目的创新实验机构。截至 2014 年，该机构运作了 67 个项目，其中 12 个成功，18 个处于观察中，18 个处于早期执行阶段，19 个不成功并已终止。为清晰区分项目成功和失败，该中心以定期随机评估的形式，通过核心模型严格数据收集和测量。被终止的项目中，有的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旨在训练护士等低收入人群获得更高薪水的职业阶梯计划，因为护士群体不再需要时遭到终止；有的是因为缺乏积极影响，如关注安全监护期间青年生活技能发展的“学习独立自主”过渡项目，因为评估无法确定是否有任何影响而终止。当项目被终止后，资金将会被中心保留，并投入到新的创新项目中。

国外实践表明，政府创新需要想象、勇气、权力和资源，并以有效的试错容错制度和文化为保障。需要注意的是，试错并不意味着乱试。任何试错都非盲目从事，也不是任何的“新点子”都必然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政府创新与试错容错都应遵循公众需求导向，并经过谨慎试验选择，纳入不同于政府日常事务处理的创新管理程序，实施有效的项目监管和评估。

•智库观点•



编者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我国智库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的趋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推动智库的发展，但是绝对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在这一背景下，辩证认识和科学对待麦甘博士主持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及其影响，对于正确认识中国智库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近日我校东吴商学院、东吴智库研究员刘亮副教授《不盲从麦甘“全球智库报告”》刊发在 2016 年 05 月 17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他指出：“智库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我们绝对不能盲目崇拜这个报告，因其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将全文转载如下：

不盲从麦甘“全球智库报告”

刘 亮

麦甘团队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的智库排名满足了公众对智库绩效评价的好奇心，但我们对其评价排名应持谨慎态度，认识到该报告的相对局限性。同时，我们要做到谦虚谨慎，立足中国国情，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和科学标准。

智库评价排名作为对智库水平、质量、效益评估的一种方式，在增强社会大众对智库的了解以及促进智库自身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6 年 1 月 27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组（负责人为麦甘）在联合国总部、世界银行、北京、上海等全球 80 多个地点同步发布《全球智库报告 2015》，综合排名榜单共列及 175 家世界智库。报告对全球 6846 家智库进行测评，根据区域分布、研究领域、特殊成就三类标准，分析各地区智库发展动态、特点和趋势，并发布了该年度各国智库数量和智库影响力排名。这是该项目自 2007 年起连续发布的第九次年度报告。报告发布后受到一些媒体的高度赞扬。然而，智库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我们绝对不能盲目崇拜这个报

告，因其仍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是智库概念界定标准存疑。对智库的准确界定是智库评价工作的前提。然而智库界定标准越严格，意味着智库评价的样本容量就会越少。智库界定的属性越多，相应的符合这一标准的智库就越少。因而智库标准和属性与其涵盖的智库数量成反比关系。《全球智库报告 2015》对智库概念的界定仍采用较为宽泛的标准。参与《全球智库报告 2015》排名的智库有七种，包括自主和独立性智库、准独立、准政府以及政府、政党、大学和企业下属的智库。按照这一标准，我国的智库机构数量远不止该报告提及的 435 家。我国有相当数量的高校智库以及中央党政部门、部委及省级行政区下属的社科院、政策研究机构和地方党校。《全球智库报告 2015》的样本是不全面的。

二是评价方法存疑。《全球智库报告 2015》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量化指标，并为了避免偏颇以及扩大排名的代表性，近几年多次对智库指数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并通过保证提名过程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来提升排名质量。但其评价

方法却仍是定性分析中的“整体主观印象评价法”，也就是基于评选专家的主观感觉来投票，进而确定智库的排名。麦甘团队在编写《全球智库报告 2015》这种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跨专业的全球性大型智库评价活动的过程中，评选人是来自 143 个国家的 4677 名政策制定者、记者、公共及私人捐赠者和智库专家，在区域和专业领域方面的均衡性均难以保证。通过对政策制定者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数据作为对智库及其专家团队的评价基础，这种方法侧重被调查者的主观感知，更易受智库声誉的影响，而非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因此评价数据的可信度不高。此外，数量众多的测评指标针对的是智库成果的评价，只有少部分指标涉及智库实际的决策影响力，而这些指标无法确切反映出政府机构是否在政策制定中运用智库成果。

三是评价过程存疑。《全球智库报告 2015》的评选和排名过程主要由智库提名、同行推荐、专家审阅三个阶段组成。麦甘团队首先在全球范围内邀请智库机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公共和私人捐助者进行智库的提名，形成初步的候

• 智库观点 •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6 年 4 月 17 日
第 1000 期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从 这 里 走 进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不言从麦甘“全球智库报告”

◎刘勇 吴昊

智库报告作为智库产品，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到智库的声誉和影响力。麦甘智库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以下简称《报告》）在国内外智库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旨在从多个角度对《报告》进行评析，探讨其在全球智库评价中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从报告的内容来看，《报告》涵盖了全球 100 多家智库的排名和评价。报告不仅列出了智库的名称、成立时间、研究领域等信息，还对智库的研究成果、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评价。这种全面的评价体系对于了解全球智库的发展现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从报告的方法来看，《报告》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定量方面，报告通过收集智库的出版物数量、引用次数、政策影响力等数据，对智库进行了量化评价。定性方面，报告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智库的研究质量、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定性评价。这种综合评价方法使得《报告》的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和全面。

然而，从报告的可信度来看，麦甘智库的排名和评价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质疑。首先，麦甘智库本身作为一家智库，其评价全球其他智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值得怀疑。其次，报告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缺乏透明度和可复制性，使得其他智库难以对报告的结果进行验证和质疑。最后，报告的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例如一些知名智库的排名与实际情况不符，这进一步削弱了报告的可信度。

综上所述，麦甘智库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 2015》在内容、方法和可信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虽然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智库的发展现状，但其评价结果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值得商榷。未来，全球智库评价应建立更加科学、透明和可复制的评价体系，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麦甘智库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报告

麦甘智库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报告，是其在智库评价领域的重要成果。该系列报告旨在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全球范围内的智库进行综合评价，以揭示全球智库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报告不仅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也为公众了解全球智库的发展提供了直观的窗口。

然而，麦甘智库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报告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报告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缺乏透明度和可复制性，使得其他智库难以对报告的结果进行验证和质疑。其次，报告的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这进一步削弱了报告的可信度。最后，麦甘智库作为一家智库，其评价全球其他智库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值得怀疑。

未来，麦甘智库应进一步改进其评价方法和标准，提高评价结果的透明度和可复制性，以增强报告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全球智库评价领域也应积极探索更加科学、透明和可复制的评价体系，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 15 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的工作汇报，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文学地理学助跑“中国学派”

文学地理学作为文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近年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它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地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启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并积极探索“中国学派”的构建。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学者们希望能够揭示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和内在规律，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做出贡献。

学术评价

学术评价是衡量学术成果质量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方法不科学、评价结果不公正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学术评价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也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公正、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势在必行。未来，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加强对学术评价过程的监督和制约，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从而激发学者的科研热情，推动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防治学术不端有《办法》

《防治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防治学术不端行为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该办法明确规定了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标准、调查程序和处罚措施，为学术界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指引。然而，办法的实施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能否严格执行和有效监督。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办法的配套措施，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确保办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也应加强对学者的诚信教育和学术规范培训，从源头上减少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选名单，然后由愿意参与到智库评选流程的智库机构、政策制定者、新闻记者以及公共和私人捐助者对第一阶段获提名的智库进行评选，麦甘团队根据推荐结果确定最终入选名单，最后再邀请相关的智库专家对入选智库的信息进行审阅并提交他们最终的推荐和排名。这一过程中，评选专家人数众多且大多事务繁忙，其专业领域、所属地区、职务职称等具体分布情况也不为大众所知。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大部分专家在评审投票过程中不一定真正关心智库的决策影响力，而更可能青睐有私人联系的或知名度较高的智库。因此，尽管《全球智库

报告 2015》排名指标体系看似严谨，但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评审专家视野的倾向性、局限性、公正程度，在此基础上得到最终结果的可靠性并不高。

四是专业力量存疑。《全球智库报告 2015》将“智库员工的素质和名誉”作为衡量智库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整体主观印象评价法”要求通过优秀的调研人员来最大程度地去除主观评价中的偏差，这需要一个严谨专业的科学研究团队。但麦甘在进行全球智库评价如此庞大的项目研究中，却只有他本人是唯一一名全职工作人员，其他部分工作靠实习生兼职完成。2015 年智库提名阶段，7000 多家智库的数据库资料仅依靠 50 名实习生完成，平均每个实习生要完成近 140 家智库的资料更新。因此，麦甘团队的专业力量也让人对其研究成果产生疑问。

五是评价忽视中国国情。智库成果的产出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一国智库的运作模式与该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远景式考察一国的政治生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该国智库运作机理。中国的智库根植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中，智库

行政级别、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关系等政治关系直接关系到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此外，“我国的智库成果很多以内部报告、国家或部委委托课题方式上交，既不可公开发表，也难以掌握领导批示、决策采纳等反馈情况”。麦甘团队很难通过公开的渠道采集到中国智库在资源、效用、产出和影响力等四个方面的全面资料。

六是评价结果存疑。在“全球智库综合排名榜单 175 强”中，中国人围的九家智库前五位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31 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35 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39 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 50 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第 64 名）；在“全球智库前 100 家（不含美国）”中，中国智库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16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27 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34 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 65 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68 名）；而在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智库排名 60 强榜单中，中国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第 4 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第 8 名）、卡耐基中国中心（第 9 名）、中国社会科学院（第 10 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 13 名）。同一份报告，只是根据地区条件不同进行筛选排名，排名结果却不一样。这样的评价结果值得商榷。

麦甘团队的“全球智库报告”系列的智库排名满足了公众对智库绩效评价的好奇心，但我们对其评价排名应持谨慎态度，认识到该报告的相对局限性。同时，我们要做到谦虚、谨慎，立足中国国情，加快构建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和科学标准。

